

央视的诗词大会尚未退热,就被后来者《朗读者》“追尾”了。本人对《诗词大会》没什么感觉,感觉其刻意做出来的东西多。但在这个爆棚的节目中,主持人董卿顺路把自己积淀的古典文学修养开发一下,且表现得不着痕迹。很多观众对《朗读者》的关注源自《诗词大会》的影响。不过,也有不少人为董卿捏把汗,担心她转场《朗读者》,原先高位的人流量会不会打折?几场节目下来证明,这种牵挂是多余的:董卿非但人气未损,还圈粉甚多。

《朗读者》的设计是别具匠心的。这个新锐节目没有“死磕”朗读不放,而是聚焦朗读者,关注朗读背后的故事和人。这样设计就对了,盯着朗读后面的人及其故事,就有戏。有逶迤曲折的故事,有生命的呼吸,节目就有不会单调,就不会一马平川、一览无余了。节目情节中有悬念,有波折,有情感的起伏和生命的转折。节目关注朗读背后的人,发掘朗读背后的故事,这种人性化的节目叙事,是《朗读者》成功的重要因素。《朗读者》凭借电视语言把这些人性化的故事直观地表现出来,成功地将其可视化,从而让这个节目变得“好看”起来。

有一期节目,《朗读者》邀请到年过九旬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人们对这位老先生的感知大多停留在:他是我们翻译界的泰



许渊冲在《朗读者》节目现场

斗。但未曾想,这位著作等身的翻译家,内心深处还珍藏着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早在大学时代,许先生曾用英文翻译了林徽因的诗《别丢掉》,向他心仪的女生表达心迹。但没想到,这一表白杳无音讯,半个世纪过去,他才从海峡对岸得到了回音。而此时,彼此皆步入人生暮年,当年刻骨铭心的情愫已石化为隔岸的风景。在节目现场,许渊冲又一次动情地朗读《别丢掉》,情到深处,老先生泪眼婆娑。目睹这一幕,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感慨岁月蹉跎,命运弄人。

《朗读者》充分发掘电视媒介的可视化优势,将过去由文字和声音组合显现的“朗读”优势转化为视觉上的优势,将情感和故事戏剧化、可视化,彰显电视媒介的魅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尽可能减少朗读环节。《朗读者》的策略是加大朗读者的比重,聚焦朗读背后的故事。在朗读节点之前,有一段长长的铺垫,尽量把“过门”工作做足,将情绪酝酿得很饱满,把故事演绎得充满张力,将观众的收视悬念充分调动起来。雷蒙·威廉斯认为:“核心的电视体验是流动的事实。”《朗

可视化的《朗读者》

■张涛甫

要求朗读者会讲故事。节目选择主人公,有意识去找那些既有故事又善于讲故事的人。这种人不能是职业“老司机”和“大忽悠”,只会用嘴巴讲话,不用心,也不会走心,《朗读者》选择的是那种能本色讲故事的人。比如,《朗读者》选择徐静蕾,不仅仅因为她是知名艺人,会表演,而是因为徐静蕾有她自己的故事,且能真情表达她对奶奶的眷念。她朗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调动的不是她的职业能力,而是她的生命情感。徐静蕾讲述她的童年往事,显然不是在表演,她已经卸掉了她的职业面具,让故事和真情自己出来说话,让所有的剧情和细节展示于电视屏幕上。

与《诗词大会》的群众路线不同的是,《朗读者》还是离不开明星路线,特别是前几期《朗读者》,明星的“吸粉”效应甚为显著。在如今的注意力市场,明星注意力“圈地运动”愈演愈烈。打明星牌,走明星路线,可轻松收割粉丝。但《朗读者》对明星的选择和开发,有其独到之处,换句话说,那些花瓶式的明星是把握不住《朗读者》的。董卿作为《朗读者》主持人,她与嘉宾的成功互动,是节目亮点和看点。董卿的表达和穿插,包括她的表情细节,自然妥帖,戏与人生水乳交融;主持人的台词与嘉宾的故事,相得益彰,成就了《朗读者》的独特魅力。

陆全根,又名荃耕、荃。“发小”者,老友也,这是北方土语,意谓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朋友。

我与全根的交往,当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说起。他比我长一岁,有个弟弟叫海根,与我同岁。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上海曹家渡,曹家渡是上海下层百姓围居之地,也是民间戏曲艺术荟萃之处,人称“下只角”。特殊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成为陆全根的民间艺术营养。记得上小学前后,陆氏兄弟总是一前一后,陆全根成了“发小”群体的领头羊,人称全根为“淘气大王”。几十年过去,少年时期玩耍嬉笑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可是当年的这群“发小”,随着上学、就业,逐渐东分西散、天南地北,与我尚有往来联系的,只有陆氏弟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陆全根,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家的电话,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因公出差,已到了北京,想见见面。我先是一惊,后是大喜,“发小”老友几十年不见,终于可以见面了。

天下真小,原来我与全根的工作性质殊途同归,都是搞编辑,为书画艺术家做“嫁衣裳”的角色。他在“人美社”当美术编辑,专为美术家的书画集搞美化装帧设计;而我则在京城《文艺报》,从事文学编辑,兼为文艺家撰写评论报道。当然他制作的“嫁衣裳”远胜过我,人见人爱,美观大方、古色古香、雅致蕴藉,又独具创意,博得海上诸多书画名家的的好评。多年后,我又获知,由他设计编辑的《中国美术全集》六十卷、《世界绘画珍藏大系》二十卷、《中国陶瓷全集》八卷等巨型美术图集还先后获德国莱比锡、捷克布尔诺国际书展最美图书奖、银奖、铜奖等奖项,国内的图书艺术大展更是频频获奖,他简直成了美术图书装帧设计领域的获奖专业户。

2016年深秋,我赴上海访友,下榻在上

发小老友陆全根

■包立民

淮海中路的“社联”院内的一家酒店。邻近的《世纪》杂志是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一家刊物,主编沈飞德作东邀宴,问我想见见谁?我说想见陆全根,他是我的“发小”老友,听说是你们文史馆的馆员。飞德听了大笑:“你请到了我们的家里人,好办,我来安排。”

记得新世纪初,我与全根在一次画家聚会活动上曾见过一面,由于人多嘴杂,未能深谈。他邀我到 he 家里作客,正是在他家里,我才看到了 he 装帧设计的诸多精美图书,满满当当陈列在书房的半壁玻璃书柜中。可是当着我的面, he 并没有如数家珍地夸说他当年如何获取各种奖项的细节和足以骄人的业绩成就。他只是把手一挥道,都是我工作份内的事,但是可以说,我是把青春全部贡献给了“人美社”。当然,他也与上海诸多书画名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从他们身上获取了诸多艺术营养。他天资聪明,又肯刻苦勤学,天道酬勤,在老一辈书画家的引导下, he 一步一步从装帧设计,转入了书画创作的轨道。

十多年后,在沈飞德的安排下,我与全根夫妇又一次见面了,白发人见白发人,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了,只是音容笑貌,丝毫未变。刚见面,尚未落座, he 就送上新近出版的《梦境》画集,又忙不及地打开手机中的视频,让我观看 he 近期应邀出席的一次盛大的典礼活动。其迫不及待、猴急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七十年前少小无猜、嬉笑争夺的孩提时代。

俗话说,三年不见,当刮目相待,何况我们已有十多年未见了。翻阅 he 送我的《梦境》画集,看着一幅一幅笔墨功底厚实、灵动,又独创新境的山水画及其书法

作品,仿佛真把我带进了似幻似真的梦境之中。我不由疑问起来,这是十多年前刚由装帧设计转入国画创作的全根老友画的吗?坐在我身旁的陆全根,难道正是七十年前我交游的“淘气大王”陆全根吗?正是在这种似幻似真的情景下,我坚请 he 画一画自己,入围《百美图》。他说从未画过自己,被逼无奈,寄来了这幅写实功底厚实的肖像自画,右侧题款道:“山笑水笑,江山多娇,留下画痕,我也笑笑。”



陆全根自画像

武大中文系“三刘”

■王江鹏

但凡看过严耕望《治史三书》的读者,相信对于严氏书中屡屡提及“大学时代最佩服的好友”钱树棠,一定印象颇深。读罢掩卷,肯定也想知道钱树棠后来的人生境遇。

幸运的是2014年第十二期的《书城》上刊有李村所撰《我所知道的钱树棠先生》一文,详述了钱树棠后来的从教生涯以及晚岁境况。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钱先生说 he 考入武汉大学那年,文学学院院长还是陈西滢。中文系最有名的老师是三刘:刘颐、刘永济、刘□。我说 he 只知道二刘,刘颐和刘永济。他又重复了一遍,刘颐、刘永济、刘□。由于口音的关系, he 还是没有听清楚。”

这段话中所谓的“刘颐”,显然是李

村的误书,本当作“刘颺”。刘颺字博平,湖北广济人,早年师从黄侃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是章黄学派的一员健将,平生著述颇丰。刘颺于1928年经黄侃推荐而任教于武大中文系,自此再未曾离开武大,直至终老于此。后来武大中文系叙系史,有所谓的“五老八中”,刘颺便系“五老”之一。据严耕望《治史三书》所载,严氏与钱树棠系1937年考入武大文学院,1941年毕业。而这一时期,刘颺正是武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至于李村所“没有听清楚”的“刘□”,则应该指的是“刘异”。程千帆曾于1941年入武大中文系执教,1982年第二期《晋阳学刊》载有所撰《刘永济传略》一文,其中便言及“(刘永济)先生在校的威望很高,但从来轻易荐人。在武大十年,就只介绍过刘夔龙先生(名异,湖南衡阳人,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可知李村拜访钱树棠时,钱先生所提及的“三刘”,当指的是刘颺、刘永济、刘异三位先生。